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沈阳

中共沈阳市委党校

地方党史研究室

一九八五年二月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沈阳

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早在建党初期，党就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由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接受我党起草的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改组了国民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沈阳（当时称奉天，下同）作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组织。

一、革命党人在沈阳的早期活动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后，沙俄是从北方侵入我国东北的急先锋，接着，日本等帝国主义相继侵入东北。经过一八九四年中的日战争，一九〇四年中日俄战争，使沈阳和东北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沈阳和东北人民对日俄等帝国主义在东北任意侵占、划分势力范围和清王朝腐败卖国，极为愤慨。为了拯救民族危机，沈阳和东北人民以极大的爱国和革命热情，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之后，不久相继派遣同盟会员商震、熊斌基、徐镜心等人来沈阳等地，联络同志，进行革命活动。(1)从此，革命党人在沈阳开始播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火种。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盛京时报》曾载有：“孙文党羽来奉之消息。”为了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〇七年春，中国同盟会总部又派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司法部检事长）、吴昆（评议部评议员）和白惠桓等人以创办实业为名来奉天，成立了辽东支部。(2)开始时，由吴禄贞、张绍曾、兰天爵和徐镜心等人负责主持工作。当时，同盟会分子潜伏于各地、各界，利用合法身分进行革命宣传，揭露清朝廷腐败堕落，号召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走向反清爱国的革命道路。接着，于一九〇九年孙中山又派廖仲恺、林佑渠等人来东北帮助开展革命工作。在沈阳，最早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的是张榕。张榕（原名焕榕，字^子华，一九〇三年就学于北京译学馆，日俄战争爆发后，张^弃学回辽，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一九〇五年在北京参与革命党人吴^慎刺杀清政府王大臣被捕，一九〇八年化装越狱，逃亡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于一九一〇年回国）于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潜回沈阳，组织革命武装，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与同盟会^员柳大年、张振仁、李德^球等人一起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张榕被选为会长。(3)当时，在沈阳

已形成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同盟会骨干分子张榕、徐镜心为代表的革命派；二是以吴景濂、肖耀恩为代表的改良派；三是以赵尔巽、袁金铠、张作霖为首的反革命派。(4)但由于张榕等革命党人缺乏斗争经验，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廿三日遭赵尔巽、袁金铠的暗算，被张作霖的便衣特务杀害。随后，百余名革命志士遭扑杀，三万余众的革命武装被瓦解，致使辛亥革命在沈阳的力量被镇压了。一九一二年八月，在革命党人的多方努力下，又在沈阳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奉天支部。(5)相继，由于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四个官僚政客组织的小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合并，改名为国民党。(6)所以中国同盟会奉天支部于一九一二年十月，也进行了改选，并更名为国民党奉天支部。设名誉部长一人，由张锡奎负责，正付部长各一人，分别由潘元沛、肖耀恩担任。(7)由于国民党拉拢一些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入党，这就使本来就成分复杂、组织松懈的同盟会组织更加松散了，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丧失了战斗力。仅就一九一二年十月改选后的国民党奉天支部成员而言，多达二百人左右。这些成员又各自为政，发展个人的势力范围，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指使暴徒枪杀宋教仁之后，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又在日本成立了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及倒袁为目标的中

华革命党。由于这个革命党是一个少数人结成的秘密组织。因此，它在沈阳也只有个别人参加，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一九一九年十月，孙中山又宣布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前，沈阳地区的国民党活动，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下，始终处于若名若暗、半公开半合法的状态中。国民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眼里，被视为无足轻重的政客。而国民党人在此期间也多以发展其个人势力为主要活动，很少发挥其组织作用。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合作后，朱霁青来沈阳，通过梅佛光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启明学社，吸收在沈阳的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其中有马愚忱、钱公来、安怀音、高崇民、阎宝航、杨大先、杜重远、臧启芳、盛桂珊、徐晟、陈日新、苏子元和共产党人韩乐然等数十人，立有章程，出版了一份《启明旬刊》。后改由《天津新民报》附印。(9)

一九二五年，正当全国革命形势逐渐高涨，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之际，张作霖惟恐国共合作的革命烈火烧向沈阳城，他在孙中山逝世不久，就迫不及待地于七月间，公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奉天支部，取缔国民党在东三省的一切活动，从而使得国民党在沈阳的一切活动被视为非法。使一些在沈阳从事革命

工作的国民党人，像散兵游勇一样，溃不成军，甚至有些人却消声灭迹了。

二、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临时党部重新建立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①实践证明，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发展。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曾委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领导筹建北方党部工作，相继在直隶、北京、天津建立了三省、市的国民党党部，成立了北方区执行部，负责指挥北方各省市的革命活动。当时，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一九二四年十月，开始转向同情革命的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权，成立了国民军。一九二五年二月又爆发了胶济铁路大罢工，北京、唐山、沈阳等北方城市，连续出现了罢工高潮。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二次劳大闭会不到二十天，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

大愤怒。从而揭开了革命大风暴的序幕。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当时，沈阳的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同全国人民一样，为声援“五卅”运动，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六·十”运动。这次反帝爱国斗争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具有组织严密、行动迅速、斗争果断、规模大、影响面广、效果显著的特点。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任意宰割中国人民的嚣张气焰，同时，也震撼了奉系军阀政权的权威。极大地提高了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觉悟。为党、团组织在沈阳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党的北方区和团中央及时派任国楠、吴晓天等同志来沈阳领导声援“五卅”斗争。任国楠和吴晓天来沈阳后，首先和学联筹委会取得了联系。在积极帮助成立学联和领导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同时，为了有组织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在沈阳组建党团组织作好必要的准备。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员高子升、苏子元的倡导下，利用基督教青年会每年暑期都要举办各种类型补习班的名义，办了一个暑期学校。由这个暑期学校的学员，绝大部分是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和部分青年会的工作人员、银行职员、小学教员等二十余人。由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玉衡）任校长，中共党员任国楠、吴晓天担任主讲教员。任

国祯讲《唯物论和辩证法》、吴晓天讲《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和妇女问题》等。同时，还吸收暑期学校休假的留日学生陈涛（字日新，国民党东京支部常委）讲《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为了个人耳目，还聘请刚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苏尚达，担任《银行与新社会》、《关税与新中国》等资本主义方面的课程。^①每天下午授课，历时约半个多月。在学期结业前，共产党员吴晓天藉以陈涛动员全体学员加入国民党，并重新组建了国民党临时支部。^②事后，陈涛把这批新发展的国民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带到日本，通过国民党东京支部转寄给广州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备案。^③这样，暑期学校就为国民党组织在沈阳重新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共合作在沈阳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暑期学校结束后，任国祯和吴晓天等人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保持和同学们的密切联系，继续扩大接触面，他们又把暑期学校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同志会（亦称同学会），先后从同志会中吸收部分进步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沈阳党支部及共产主义青年团沈阳特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由任国祯担任，团特支书记由吴晓天负责。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共沈阳党支部经研究派跨党的中共党员吴村（专做民运工作），去北京北方执行部联络部联系工作。并由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指派吴村前往广州，列席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吴村取海路返回东北，途经大连，在大连增智学校停留数日。同时，在大连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其中有增智学校校长林升平、教员张月山、李仲刚等人。并建立了国民党大连党部，由林升平负责党部工作。吴还通过林升平的介绍，去瓦房店第九小学，从教师中发展了三、四名国民党员，有小学校长孙生、教员高精一等。吴村回沈后，立即着手筹办奉天省党部工作。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召开了国民党全体党员大会，当时，在沈阳共有国民党党员五十余人（其中包括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国民党奉天省临时党部，并选举以钱公来为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设常委五人，其中有跨党的中共党员三人。吴村还被推选为组织部长。当时，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巩天民、吴执中、周东郊、张景珍等，都先后被选派为国民党奉天省临时党部的工作人员。一九二六年夏，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为筹建奉天地区的国民党党部（正式），委派北大、朝大和中国大学的毕业生韩继庭、王育文、孟厚、孟传大和于仲达等人来沈阳从事筹建省党部工作。但是，这些人到沈后，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被钱公来等人所排斥而来

委重任，意被分配到教育界。在学界任职和到东北大学补课。

①后来这些人则以启明学院名义，成立了一个补习学校，广招学员，宣讲党义（三民主义），吸收党员，成为后期国民党在沈阳的活动阵地。

三、合作后的活动及其分裂

在沈阳，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是在奉天军阀的严密统治下建立起来的。当时，两党的活动十分艰难。但由于双方都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宗旨和目标，配合较好。开始时，中共沈阳党支部曾发动党团员，为国民党在沈阳主办的《东三省民报》撰稿，公开揭露帝国主义在沈阳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文化等各种侵略行为，还组织党团员进步青年散发传单，号召广大市民抵制日货，搬起不售日货，不用日货、不购日货和销毁日货浪潮；要求民族独立，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活动，以及积极组织发动城乡人民捐款支援上海难胞等活动。这些都是可歌可泣的。

继“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反奉斗争高潮。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爆发了郭松龄倒戈反奉战争。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联合发表了“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②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电，指责日本出兵奉天，侵略我国主权，号召国人一致奋

起 (21) 接着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一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工具的奉张及安福政府，现在已公然在日本政府面前求救了！一向替奉张及安福保护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已经公然出兵援助张作霖，抵抗郭军了！……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此次由反奉而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主自由。

(22) 同时，《向导周报》连续发表文章，痛斥日本、张作霖。东三省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罪行极为愤恨，他们不顾奉张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进行了坚决而积极地斗争。东北的留日学生停学回国以示反抗，散发了痛心疾首的抗议宣言，指出：“当此之时，大丈夫当效班定远（班超）之投笔从戎，马援之马革裹尸，岂能生死儿女手中也 (23) 当时，“奉天学联”在中共沈阳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满州医科大学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声援反奉战争问题。经过讨论，决定以学联名义发布反奉宣传，并向郭松龄提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要求。同时开展欢迎郭军进城的准备 (24) 他们一方面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党团员撰写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相勾结，穷兵黩武，祸国殃民、卖国求援，狼狈为奸的卑劣行径。另一方面，积极串联，秘密赶制欢迎郭军入城的旗帜和其它各项准备工作。虽然这次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由于在日本出兵进行武装干涉下

失败了。但是，这次郭军反奉战争，却给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沉重打击。应该指出：郭松令之所以能够毅然倒戈反奉，绝不能仅视为郭张之间的个人矛盾，而是和当时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影响，以及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分不开的。其进步意义也是可以肯定的。特别是值得提出的是在郭松令反奉之前，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就预料到当时的形势，曾从河南调朱霁青回东北组织国民革命军，作为郭军反奉的策应，并拨款三百万元为动员费，指令其待机举事。⁽¹⁾对此，朱霁青见有机可乘，随伴称无广东国民党中央命令不敢从命为借口（实际上朱本意是不受共产党人的越俎代庖），竟擅自先郭松令出关，“在沈阳神学院（英国人办教会学校）与钱公来等人秘密组织了国民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²⁾刻关防，填发委任状”⁽³⁾准备待机暴动。然而，当郭军逼近沈阳时，他发现“沈阳城，八门八关，由日本军人把守，检查过往行人。城内可闻炮声，风声鹤。”⁽⁴⁾

⁽¹⁾他不但敢举事接应，反而把总令部从沈阳迁往哈尔滨马家沟驻守。同年十二月末，郭军倒戈失败，朱霁青闻讯逃出国外，取道苏联去广州。在沈阳主持国民革命军军务的钱公来，也逃往农村躲藏了两个多月。而共产党人任国祯同志等却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

正当国共合作顺利开展，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刻，在革命阵营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突出地表现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上层分子日趋分化。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右派暗杀了左派领导人廖仲恺。接着于十一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等人在北京西山^云集会，形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西山会议派”。在西山会议派的影响下，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右派也蠢蠢欲动，并于一九二六年夏，以“民族自治同盟会”的名义，散发反共传单，破坏国共合作。当时，在沈阳从事《东三省民报》编辑工作的俞若愚和原北关中学学生孙××等，曾多次给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吴作村（跨党的中共党员）写密信，要求辩论国共合作问题并提出所谓中国共产党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吴作村同志注意周围。。。

②③这一切都是为制造国共分裂作舆论。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蒋介石妄图独揽大权，破坏革命，随于三月间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接着，于五月又提出了一个破坏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排挤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一九二六年夏，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负责人，钱公来等却一反常态，唆使跨党的李光忱叛变，制造谣言，赶跑了跨党的中共党员。国

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的常委兼组织部长吴尔村，并从跨党的共青团员张景珍手中，夺走了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的印信（印章）。④重新改选了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执监委员会。改选后的国民党奉天省临时党部的成员中，跨党的共产党人只占执监委员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钱公来、李光忱等人还按照“整理党务决议案”要求，从中共沈阳党支部书记杨名坚手中，把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名单要去备案。同年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进一步加紧控制东北地方整理党务的工作，又从黄埔军校四期指派应届毕业生刘不同、包景华、刘广泰、王立亭、单成仪等五人来沈，组成党务整理指导委员会，进行党务整理工作。因为他们对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一概加以敌视和排挤，有些跨党的党团员，除担任职务和自愿留在国民党者外，很大一部分跨党的党团员脱离了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党奉天省党部遭到破坏。省党部负责人钱公来等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李光忱逃往武汉。为了免受牵连和破坏，中共沈阳支部经研究，机警地通知在国民党奉天省党部备案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如吴执中、白希清、高启福、孙广庆、江金铭等十余人转移到北京、大连、哈尔滨和郊区隐蔽。

从此，沈阳地区的党团组织力量相对减弱了。特别是一九二七

年六月末。中共沈阳支部书记任国政和委员杨志云，因组织奉天制纸株式会社（现沈阳第二纺织机械厂）工人罢工斗争，被日本警察逮捕。中共沈阳党支部的活动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沈阳就此结束了。

注

(1)(2)(4)《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卷第560、536、

541页。

(3)(5)《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143、314、

331页。

(6)《中国国民党史稿》上卷第105页

(8)(13)《苏子元回忆录》

(9)《孙百急回忆录》

(10)《晨报》1925年7月23日

(11)《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53页

(12)《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工人运动》

(14)(16)《陈涛回忆录》

(15)《吴晓天向团中央的报告》

(17)(17)《吴作村回忆录》

(19)《革命人物志》第一集第367页

(20)《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二卷第490页

(21)《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2日

(22)《向导》139期

(23)《张作霖档案17》

(24)《高洪光回忆录》

(25)(26)(27)《革命人物志》第一集第377—378页

(28)《吴竹村回忆录》

(29)《革命人物志》第八集第198页

(30)《访白希清同志谈话记录》